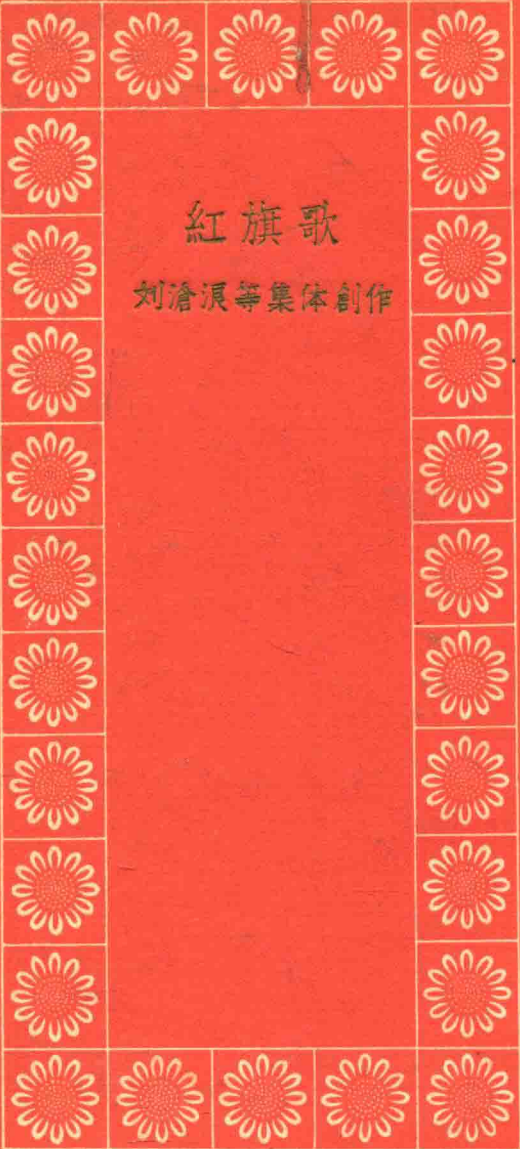




紅旗歌

刘滄浪等集体創作

目錄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附錄四 附錄五 附錄六 附錄七 附錄八 附錄九 附錄十 附錄十一 附錄十二 附錄十三 附錄十四 附錄十五 附錄十六 附錄十七 附錄十八 附錄十九 附錄二十 附錄二十一 附錄二十二 附錄二十三 附錄二十四 附錄二十五 附錄二十六 附錄二十七 附錄二十八 附錄二十九 附錄三十 附錄三十一 附錄三十二 附錄三十三 附錄三十四 附錄三十五 附錄三十六 附錄三十七 附錄三十八 附錄三十九 附錄四十 附錄四十一 附錄四十二 附錄四十三 附錄四十四 附錄四十五 附錄四十六 附錄四十七 附錄四十八 附錄四十九 附錄五十 附錄五十一 附錄五十二 附錄五十三 附錄五十四 附錄五十五 附錄五十六 附錄五十七 附錄五十八 附錄五十九 附錄六十 附錄六十一 附錄六十二 附錄六十三 附錄六十四 附錄六十五 附錄六十六 附錄六十七 附錄六十八 附錄六十九 附錄七十 附錄七十一 附錄七十二 附錄七十三 附錄七十四 附錄七十五 附錄七十六 附錄七十七 附錄七十八 附錄七十九 附錄八十 附錄八十一 附錄八十二 附錄八十三 附錄八十四 附錄八十五 附錄八十六 附錄八十七 附錄八十八 附錄八十九 附錄九十 附錄九十一 附錄九十二 附錄九十三 附錄九十四 附錄九十五 附錄九十六 附錄九十七 附錄九十八 附錄九十九 附錄一百

紅 旗 歌

刘滄浪 陈怀皚 陈 森 刘木鐸等

集 体 創 作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3 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83 字数 117,000 开本 850×1168 幅 $\frac{1}{32}$ 印张 $5\frac{1}{4}$ 插页 1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4) 1.30 元

出版說明

《紅旗歌》是解放战争开始轉入全面进攻、革命的領導力量开始由农村轉移到城市以来第一个以工人生产为題材的剧本，它真实地反映了党对解放不久的城市中的工厂进行初步的民主改革、对工人群众（包括管理人員）进行思想教育所作的努力与所获得的成效。剧本通过主人公馬芬姐由落后轉变为先进的具体过程，表现了工人群众中两种不同的劳动态度的斗争和工厂管理上两种不同作风的斗争。馬芬姐是一个在旧社会的重压下心灵受了創伤的年輕的紡紗女工，在解放前她两次被厂主开除，因而对紗厂积下了深仇，直到解放后她还敌視工厂和工厂的管理人員，在生产上采取給多少錢干多少活的消极态度，对厂里蓬勃地展开着的紅旗竞赛运动抱着明显的抵触情緒，因而成为厂里典型的落后分子。工厂的助理員万国英，一个旧管工，仍象解放前那样粗暴地斥責她、惩罚她，甚至要开除她；同时以张大梅为代表的少数积极分子又对她采取冷嘲热諷、排斥打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彭刚、金芳和其他同志一方面和万国英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了张大梅等脱离群众、个人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以民主的作风和說服教育的方式耐心地帮助和团结馬芬姐，終

于促使她覺悟和轉變，成為一個十分積極的工人。

《紅旗歌》歌頌了覺悟了的工人群眾在生產競賽中表現出來的高度的勞動熱情，批判了工人中落后的僱傭觀點和積極分子對待思想上落后的同志的錯誤態度；《紅旗歌》也說明了做好工廠的管理工作、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的關鍵在於依靠工人階級，提高工人群眾的覺悟，而要提高工人群眾的覺悟就必須使管理民主化，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紅旗歌》在發表和上演後之所以立刻成為一個受到讀者和觀眾熱烈歡迎的優秀劇本，除了人物性格刻劃的生動和個性化的語言等藝術上的成就之外，主要就因為它的思想內容對當時城市中的工人群眾和工廠管理人員具有積極的教育作用。

本書於1949年5月由天津新華書店出版，後經作者作了兩次修訂，於1953年4月改由我社出版，現據修訂本重排印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2月

論《紅旗歌》(代序)

周 揚

《紅旗歌》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慶、蘭州等城市陸續演出，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特別是工人們的歡迎。在上海已連演一百四十八場，現在還在繼續；在南京的演出也突破了從來該地話劇賣座的紀錄。

這個劇本的成功，是偶然的嗎？

對於這個劇本，不只根據它的演出效果，而主要地根據劇本本身思想藝術價值的具体分析，作出一個比較恰當和正確的評價，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為關於這個劇本已有各種不同的批評的意見，有些批評的意見是不恰當、不正確的，對它作一個比較恰當和正確的評價，就更有必要了。

必須肯定，《紅旗歌》是一個好劇本。它之所以好，就在於：它是第一個描寫工人生產的劇本；它用藝術的力量，表揚了工人在生產競賽中的高度勞動熱情，批評了工人中的落後分子，也批評了某些積極分子對待落後工人不去耐心團結教育而只是譏諷打擊的那種不正確的態度；表揚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風，批評了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這一切都通過了活生生的個性的描寫。作者在人物性格的雕塑與語言的運用上顯示了優秀的

才能。这就是为甚么这个剧本具有教育人、感动人的力量；不管它还有某些缺点甚至比較严重的缺点，我們要給予这剧本以較高的評價。

剧本的故事是发生在人民解放战争轉入胜利进攻，人民革命領導力量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們进入城市第一个遇到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依靠工人，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学会管理工业。在这个問題上，我們曾不得不克服一个特殊的困难，就是：由于我們党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后，退入农村，在农村坚持斗争二十年之久，在这二十年当中敌人一直占据了城市，因而造成了共产党与自己的阶级——工人阶级长期隔离的状态，以致我們胜利回到城市的时候，不但許多工人受了敌人长期欺騙宣传的影响，对自己的政党不能立刻認識；同时我們的許多干部，他們大都是农民出身或是长期在农村斗争过来的，对于自己的阶级群众、城市产业工人也一度发生了生疏的、“格格不入”的感觉。許多干部曾經缺乏明确的“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而如果这个根本思想、根本立場不建立起来的话，我們是沒有办法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把工业管理好的。这种思想上的模糊，受到了党的及时的提醒。解放以后，工人阶级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現的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及他們所創造的各种模范事迹，充分表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我們許多干部的“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紅旗歌》第一次把工人在生产竞赛中所表現的高度的劳动热情及在生产竞赛中所發生的問題搬到了舞台上。

剧本一开幕就展开了生产竞赛的热烈的場面。女工們完全卷入紅旗竞赛的热潮中了。当細紗組生产組长也是工会分会主任的老刘說：

“這些小閨女們哪，看着那紅旗比命還值重哪！”

一個女工馬上答嘴：

“我們自个兒為了積極生產，發動的競賽，自个兒流汗爭來的紅旗，為甚么不值重呵！”

這些女工們為了爭取紅旗，飯不吃、水不喝地干着活。正如組長老劉所說的：“半年以前沒解放的時候，他們作夢也沒想到會過這麼痛快，也沒想到這輩子還有這麼大心勁兒……”工人們一經解放，他們的政治覺悟就很快得到啟發和提高；他們蘊藏的勞動的創造的熱情和精力就會象源源不絕的泉水一樣噴射出來，他們憑着這股勁兒就能夠改變世界的面貌，創造出歷史的奇跡。在競賽中涌現了大批積極分子，他們和落后分子劃分了顯明的界綫。一切工人，前進的和落后的，都將在競賽中受到嚴格的考驗。

下面是一個年幼的積極分子仙妮和一個同樣年幼的但是盲從的落后分子小美姑之間的一段有趣的對話：

仙 妮：……這會兒工廠是咱們自个兒的啦，為咱自个兒干活兒，積極生產，支援前綫，得了紅旗多光榮呵！

小美姑：光榮？——光榮也吃不的，也喝不的，有什麼用呵！

仙 妮：多勞多得，你不知道嗎？得紅旗多了，到年底還發獎金哪！

.....

小美姑：到年底還有好幾個月哪，誰知道到時候發不發呀？——你們沒聽我芽姐說呀，反正這會兒我們知道得了紅旗也不多掙一斤小米兒，不得紅旗也不少拿半張票兒，光圖干活兒緊哪？——我們才不當那傻瓜蛋哪！

對於紅旗的何等不同的看法呵！在這裡就顯示了工人中的

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的全然不同的政治态度与劳动态度。一个把工厂看成自己的，把得红旗看成顶光荣的事；一个仍然以过去工人对待私人厂主的态度对待国家工厂，仍然抱着多挣钱，少做活的老主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已经开始有了主人翁的感觉，一个则还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她仍然保持着旧的习惯和旧的思想。

作者在这里作了一个戏剧性的安排：两个小鬼的吵嘴不过是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两方面的一个前哨战罢了，接着登场的是双方的“两员大将”，被称为“瞎积极”的张大梅与被称为“马蜂窝”的马芬姐，她们围绕红旗竞赛展开了一连串的斗争，成为剧本的中心纠葛。作者从始到终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工人中的前进分子必须耐心地去团结、争取与教育落后的分子。

所谓“依靠工人阶级”，是甚么意思呢？主要就是依靠工人的觉悟性与组织性。对于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必须启发他的政治觉悟，鼓励他的劳动热情。对于已经有了觉悟的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必须进一步提高他的觉悟程度，提高他在生产劳动中的团结互助精神。

剧中作为落后工人的突出的代表的，是被积极分子骂为“顽固堡垒”的马芬姐。马芬姐是怎样一个人呢？据作者的介绍，她是“一个被旧世界的剥削、压榨、凌辱所歪曲了的性格”。她在日寇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两次毫无理由地被开除，因此她给工厂记下了“大仇”。解放了，但在她看来，“今天解放啦，可是工人还不是穷工人，助理员还不是助理员，人家还不是把咱当成拉套牲口的？”特别是对于那位解放前开除过她，解放后还是那样看不起工人的助理员万国英，她一直记着仇。她完全用旧的眼光来看解放后的工厂和管工人员。“没有哪一回工厂不是向着管工的，还能向着咱们穷工人？”对于竞赛，她自然是反对的。“甚么

競賽，紅旗，還不是哄你們多干活兒！？”在競賽的群眾熱潮中，她感到了孤立。“競賽才不過兩個星期，總共也只有二十天，就讓你們弄的我站沒站處，立沒立處，沒處藏，也沒處躲！？……你們把我當成大糞車子似的，誰見了誰恨，走到哪兒哪兒臭！？”在這種情況下，她就越發曠工、跑車、甚至扔白花，直到最後扔下圍腰、証章，走出工廠。

馬芬姐這樣的人物是現實的嗎？不管作者對於這個人物的孤僻倔強的個性的過份渲染，這個人物的落後思想心理是有它的社會根源的，是有它的一定的代表性的。工人与厂主历来是处于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職員虽然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由于他們工作職務、生活條件、思想意識比工人不同，因此工人与職員，特別是一些比較更接近資本家的上層職員之間，在過去也常常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原来屬於官僚資本家的工厂，現在屬於人民的國家所有了，因而工人与工厂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厂是工人自己的了”。但是要使每个工人意識并且适应这个变化，这就需要他在思想上認識工人是國家的領導階級，并且根据他親身的經驗来达到这个認識。工人与職員的关系也要經過一番團結的努力才能获得協調。蕭殷同志在評《紅旗歌》的文章（載《文艺報》第十一期）中，認為象馬芬姐那樣“在旧社会被压迫得深重”的工人“應該很容易接受新社会的思想，很容易理解新社会与旧社会在本質上的不同”，他懷疑在解放了半年以後的工厂，还会有象馬芬姐這樣“頑固”“落後”的性格存在的可能，因此他覺得“馬芬姐這個人物是不現實的，是缺乏社會基礎的”。“應該”是一回事，“可能”又是一回事。在解放不過半年時間，工人的政治覺悟還沒有普遍提高，工人物質福利還沒有根本改善的情況下，工人中有象馬

芬姐这样“頑固”“落后”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现实的，并不奇怪的。就在今天也还是如此。

認識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本質的不同（不是表面上的不同），并不是象萧殷同志所說的那样一件容易的事。不錯，馬芬姐在旧社会受过压迫，反抗过；但那不过是一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对旧社会的这种反抗，到了新社会就不完全合拍了，有时反成为个人与新社会結合的障碍。这样的情形是常見的。認識和适应新社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于旧社会所遺留給人民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我們必須有足够的估計，用长期教育的工作去改变它們。蔡天心同志在《〈紅旗歌〉的主題思想》一文（載同期《文艺报》）中，也同样忽視了旧社会遺留給广大人民思想上的坏影响。他說：“旧社会，工人階級在統治者的殘酷压迫之下，为了反抗，工人也学会运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反对統治階級，怠工、破坏，但一般的都是團結一心，而不是工人們彼此互相傾軋、誣陷。就是最沒有觉悟的工人，也还講一些义气，而不肯做損人利己的事。只有少数沾染了剝削階級意識的流氓工人，才專門誣陷別人，而这样的人也大都是統治者的狗腿子。”在这里，蔡天心同志只看到了大工业的发展与工人階級的利害一致，促使工人團結了起来，但他沒有看到旧社会的各种統治者如何用收买、分化等等方法来破坏工人的團結；工人中的行帮、宗派，对于工人的團結发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一百年以前，《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来！”的口号，今天还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共同奋斗的目标。因为民族的、地域的、宗教的、政治的种种原因而被分裂了的全世界工人階級要在共同的政治方向下通过各种具体行动而日益扩大地團結起来，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伟大的任务。如果工人已經“團結一心”了，那还用得着工人階

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用極大的努力在廣大工人群眾中間去進行團結工作和教育工作嗎？難怪在蔡天心同志看來，馬芬姐既然那麼落后，不，簡直是“無法無天”，對於她就應當實行“組織處分與紀律制裁”，而不應當那麼委曲求全地去團結和爭取她；他認為這種團結是毫無原則的。他以我們所要求於一個共產黨員的組織性紀律性來要求一個落后工人，因而對她做出無情的判決。對於這個人物的這種處理方法，無論從藝術上或實際上說，難道是正確的嗎？

工人階級要團結和領導全國人民必須首先自己團結一致。積極分子應當成為團結的骨幹。但是積極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卻恰好是個人突出、脫離群眾；而這種毛病在競賽中就特別容易顯露出來。大梅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代表者。美蘭的本位主義不過是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另一種表現罷了。因此在生產競賽中必須強調個人模範與集體模範相結合，先進的幫助落后的，英雄帶動大家，這才是真正新的集體主義的英雄主義。一切個人突出、驕傲自大、本位主義等等，也都是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壞習慣和壞思想。劇本中對張大梅這個人物給予了適當的批評，是完全必要的，有教育意義的。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人民……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响（這個影响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

在這裡，毛主席明確指示了：第一，必須充分估計，反動統治

者所給与人民思想上的坏影响是很大的，并将长期存在的；第二，人民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必須采用民主的方法。

要启发和提高工人的自觉性、积极性，主要关键就在管理民主化；工厂管理人員在工作中要走群众路綫，要有民主作风。《紅旗歌》表現了工人在生产战綫上新的劳动态度（包括团結互助）与旧的劳动态度之間的斗争，同时也表現了工厂管理上两种不同的作风，即彭管理員所代表的民主作风与万助理員所代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之間的斗争，这两种斗争交錯着，就构成了《紅旗歌》的全部主题。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思想根源是甚么呢？主要就是“看不起群众”。万国英根本不相信工人的觉悟。他說：

……工人生成的就是想多掙錢、少干活兒，管理上就是想增加产量、提高質量、減低成本。管理和工人根本是矛盾的，……

……真要提高生产，达到标准数，只要管理上訂计划、下命令、有魄力、有信心、勤查勤管，有錯就罰，就会完成任务，根本用不着发动群众，根本用不着讓她們自个兒管理自个兒！

在他看来，甚么“民主管理”，甚么“生产竞赛”，都不过是“自找麻煩”。万助理員的这种思想和作风在新解放城市的旧技术人員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萧殷同志認為“这个人物也是不够现实的”。他說：“据一般情形，城市解放之后，工人就有訴苦运动，对于有坏作风的人員，一定受到群众的批評教育，即令他們在思想上还存留着旧的渣滓，但他們懂得共产党是反对欺压工人的，他們絕不敢做得这么露骨（象万国英那样）。即使旧思想偶而冒出来，欺压了工人，而工人們也絕不会認為他的欺压行为就是厂方的意志。”这里所举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一般的情形，

城市解放之后，工人并没有訴苦运动。而旧人員的旧的作风也没有那样容易改变；他們习惯了那套旧的管理方法，那跟他們的整个思想和經驗是分不开的。他們思想上存留着的“旧的渣滓”，岂只“偶而冒出”一下，而是在他們工作中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象万助理員那样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不但在新解放城市的旧人員中，而且在老解放区的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干部中，也是存在的。正如刘少奇同志在最近庆祝五一劳动节的講話中談到我們工作中的缺点、錯誤时所說的：“錯誤中最严重的是命令主义的錯誤。”我們在生产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中都必须反对我們干部中的命令主义的錯誤作风。蔡天心同志不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倒認為万国英是“一个品質很好的同志”，好象他的那种命令主义的錯誤，不过是工作作风上的一点“缺点”，并不严重；好象我們今天在工作中所要反对的，主要并不是干部的命令主义的作风，而是人民群众的“落后”。这难道是正确的嗎？

《紅旗歌》批評了万助理員的命令主义作风，表揚了彭管理員的民主作风，是完全需要的。自然，彭管理員还不是管理民主化的完滿的体现者。但无论如何，他的作风是民主的，他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不是“吹鬍子瞪眼”，而是带着滿腔的热情与十分关切的态度。他关心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对他們的缺点錯誤耐心地进行說服教育，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就是馬芬姐也不能不講他好：“你把我当人看待”，这是从心里說出来的感激的話。

要发动和組織生产竞赛，单靠个别管理人員的民主作风和耐心說服教育的方法，当然还是不够的。生产竞赛是一个广大工人群众的自觉的运动，是行政管理上一个巨大复杂的組織的工作。没有坚强的党的政治领导和工会的积极活动，没有党、工会和行政組織在工作上的良好的配合，竞赛是发动不起来的，即

使发动起来也是不能坚持下去的。《红旗歌》的主要的也是比较严重的缺点就是沒有很好地表现出工厂中党的领导和工会活动的作用。不错，彭管理員、老刘、金芳都是代表党的人物，但是看不見党的集体的领导，只看見彭管理員一人“单枪匹马”。党员的形象显得沒有力量。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的上海工人，看了金芳这个人物，就觉得她太软弱了，不够他們所理想的共产党员的水平。他們的这个批評是很对的。工会的活动也太少，几乎完全成了行政的附庸。工会分会主任老刘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送配卖面到馬芬姐家中，并送还她的围腰、証章，通知她回厂，这一件事引起了正在絕望中的馬芬姐思想上情感上激烈的变化，使她走上最后的转变。工会关心工人的物質福利，并在可能条件下改善工人生活，对于启发和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巩固他們的劳动紀律，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工会，应当抓紧一切机会对工人进行阶级的政治的教育；作为工会分会主任的老刘却沒有尽到这样的責任。他对馬芬姐的錯誤沒有进行过一次認真的批評。不但是他，就是彭管理員、金芳，在对待馬芬姐的錯誤上，耐心說服是很够的，但有些地方却表現了过多的感情的迁就。就团结和教育的方法上的这种缺点來說，蔡天心同志的批評是对的。新社会的劳动紀律所以与旧社会的劳动紀律不同，就在：它是建立在广大工人自觉的基础上的；它首先是靠說服教育的方法建立与巩固起来的。但在工人自觉水平不齐的情况下，不能仅仅限于說服鼓励的方法，同时还要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来对付好吃懶做、破坏劳动紀律的分子，虽然馬芬姐还不是这样的分子，她还不是真正存心破坏生产。

在《红旗歌》中，工厂的正规的民主管理制度並沒有建立起来，这种制度是必須通过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人代表会议等等

組織形式才能正式建立起來的。這個工廠不過在管理民主化上走了第一步。《紅旗歌》中的競賽也帶着生產競賽運動的初期的、甚至自發的形態。我們看到工人一經解放就立刻爆發出空前未有的勞動熱情，這股熱情是蓬蓬勃勃的，但還沒有凝結起來，形成新的生產秩序與新的勞動紀律。《紅旗歌》的許多場面給了人一個印象，好象在這競賽中工人們並不在緊張生產，而只是在爭執和吵架，這固然是為了展開劇中人物的思想鬥爭，並且因為正面表現生產過程受到舞台的限制，但同時也反映了這個工廠的生產領導還沒有完全納入正規。紅旗競賽也還只是單純依靠工人的生產熱情和提高勞動強度，而還沒有轉入到節省原料、減低成本、發明創造、改進技術的方面去。現在我們的工業生產，我們的生產競賽是前進很遠了！在東北，展開了群眾性的新紀錄運動。這個運動已由個人的新紀錄發展到集体的新紀錄，由單純提高勞動強度的新紀錄發展到改進技術操作、生產保安和發明創造的新紀錄了。因為《紅旗歌》中的競賽還是初期的，在這競賽中進步了、轉變了的張大梅、馬芬姐、萬助理員，他們的進步和轉變自然也還只是初步的，基礎不穩固的，在他們面前還等待着有更多的考驗。

《紅旗歌》正是反映了我們工業生產戰綫上的初期的情況和缺點。作者對於當時的情況自然也還沒有反映得完全，他還沒有比現實看得更遠。

《紅旗歌》沒有足夠地表現工廠中黨的領導與工會活動的作用，但卻過多地、不適當地描寫了馬芬姐的孤僻、頑強的性格，使工業生產上的嚴肅的思想鬥爭，在某些地方變成了大梅和芬姐兩個不同性格的衝突，這就形成了這個劇本的另一方面的缺點，削弱了這個劇本的教育意義。馬芬姐的轉變，在第三幕是已